



豕尊。因为这对“獠牙”，学界曾一度判断豕尊是野猪造型。但当时未阉割的、年满3岁的家猪，也会露出呈獠牙状的犬齿。

◀ (上接14版)

满3岁的家猪，也会露出呈獠牙状的犬齿。”记者看到，在豕尊的“猪背”上，还有一个椭圆形的盖子，盖上立着一只鸟。“这只鸟原本已经坏了，这是根据残存情况复原的。”熊建华介绍道，鸟站在猪背上，其实是当时牲猪野外放养的一个佐证。记者看到，在豕尊身体两侧的“猪肘”处有四个洞，其中有横穿的管孔。熊建华说，学界推测古人可能在此穿上棍子或藤条或绳子，用以抬举。在这件豕尊的“猪头”左后方、“尾巴”等部位，记者发现有些地方的花纹并非严丝合缝。“这就是留在器身上的历代修复痕迹，可见这件器物曾经长期被反复使用。”熊建华说，“公猪在古代可是最神圣场所的祭品，而且只有地位极高的人物才能拥有。”

那么，这件豕尊是怎么被发现的呢？“豕尊是在挖地基的时候发现的。”熊传薪告诉记者，1981年年初，湘潭县九华公社桂花大队船形山生产队队员朱桂武在平整新房地基时，发现了这件猪形铜器。次日，朱家父子便抬着这只30多斤的铜猪去县政府。考虑到县里没有文物管理部门，县政府建议他们乘车将铜猪运到位于长沙的湖南省博物馆。当时，湖南省博物馆考古部主任介钧接待了他们。“奖励了他们父子800元。”熊传薪说。

经专业人士鉴定，这是一件商代的豕尊。于是，湖南省博物馆立即派人前往调查豕尊的出土地点。据何介钧在《湘潭县出土商代豕尊》一文中的记录，豕尊出土于长沙南约20公里的湘江西岸，尊埋在距离地表1.5米、直径约1米的圆坑中，圆坑附近没有其他器物，豕尊

属于窖藏出土。有趣的是，近豕尊处的填土是疏松的山沙，与窖藏本身的泥土不一致。考古人员认为，沙土不积水，豕尊周边填满沙土，应当是为了保证铜器周边相对干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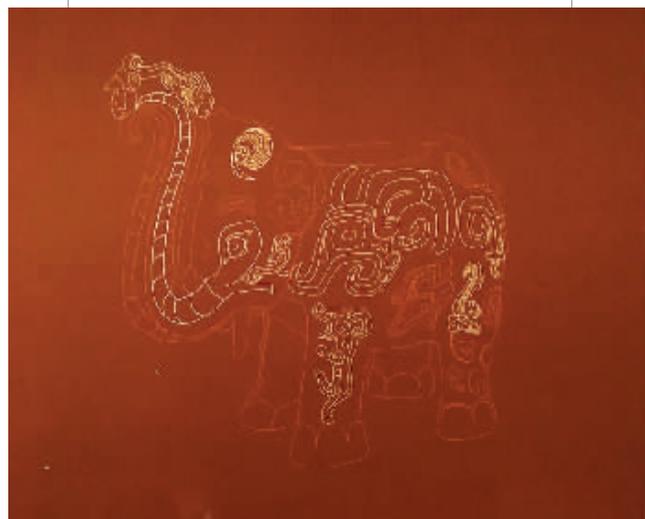
熊传薪告诉记者，同样在修房过程中发现的，还有1977年在衡阳市郊出土的牛尊（牺觥）。这件器物在“湖南人”展览中也可以看到。熊传薪说，从这件牛尊的头部和角形判断，它的外形参考了江南地区常见的水牛形象。牛背上有个盖子，盖子上铸有一只老虎，既起装饰作用，又是实用的捉手。牛身上还装饰有凤鸟纹、龙纹、兽面纹等。“牛尊虽然不大，但制作非常精良。”熊传薪说。

植树邂逅象尊

在展览中，还有一件动物造型的器物人气颇高——象尊。在象尊后的展板上，还绘有线描图。“象尊虽小，但器身花纹极为繁缛。”在熊建华的指认和讲解下，再结合线描图，记者发现象尊本身就是个“动物乐园”：“象鼻”前端有一鸮，鸮上伏一虎，虎口衔一蛇，“这个蛇叫烙铁头蛇，现在湖南邵阳、郴州一带还有”；“象额”中点部位两侧各蟠有一条蛇；“象耳”正面是双头蛇状纹饰，背面是一对凤鸟，耳下是凤鸟纹；“象脖”向后延伸一直到“象腰”的地方，有虎首图案，“象肚”下还有兽首；前腿上有虎纹；在臀部和后腿部分，饰有兽首和夔龙纹。“象尊可以说是在动物身上叠加动物，从头部前腿到前腰就有14个动物。”熊建华说。

那么，象尊又是如何被发

现的呢？“象尊是农民种树时候挖到的。”熊传薪告诉记者，1975年2月，湖南醴陵市仙霞公社狮形山的一位农民在山上植树时，在距地表15厘米处挖出一件精美的青铜器。当时，这件青铜器还滚到了山坡下，他将它捡回来，回家后放在火里烧，发现烧不坏，就放在了家里。一天，公社干部去他家时，看到了这个青铜器，就给湖南省博物馆写了信。熊传薪收到



象尊及其纹饰线描图

信后，前往公社调查。“我到了以后，发现这是件商代的青铜器。”他说，按照当时有关规定，他只能按1.5元/斤的铜价向农民回收这件器物，“这件5斤重的象尊，当时只要7.5元”。考虑到文物的价值，熊传薪提出再奖励农民30元，“结果公社干部不同意这么‘高额’的奖励，最终商议下来，补助了农民15元”。熊传薪记得，1978年改革开放后，这位农民特地找到熊传薪，后追加了400元奖励费。熊传薪说，湖南发现的象尊不止一件，但目前明确出土地点的仅此一件。比如，收藏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和法国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的象尊虽都被认为出土于湖南，但准确的出土地点并不清楚。

在湘江流域，为什么会突然出现“象尊”呢？熊建华认为，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出自中国农业史上“象耕鸟耘”的提法，即从一些史事记载来看，商时期人们认为经大象踩踏过的土地是最好的“耕地”。当时的湖南也是大象的一处活动区域，因此象尊可能是湘江流域的商代人对“象耕”这种文化记忆与现实存在的形象表达。另一种解释是，象尊可能与某个古老的象图腾部族有关，具体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湖南缘何多动物形器

在“湖南人”豕尊的展览说明上，有这样一段话：“以动物造型的尊，艺术地表现了人们的原始宗教观念，作为人与神灵之间的沟通媒介，起着巫术般的祈愿避邪作用。”

对于湖南为什么出土这么多动物青铜形器，熊传薪提出两点推测：一是可能是由中原人入迁湖南时带来的；二是可能是当地人就地取材，把看到的想到的动物用青铜表现出来。“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当时的青铜器铸造工艺已经登峰造极。”他说，尤其是湖南出土的青铜器在形式上别具一格，且技艺臻于完美，“说明湖南在3000年前已是文化相当发达的地区，艺术欣赏和创作水平都很高。”

对此，熊建华有他的见解：“湖南青铜器的纹饰意义，可能更多的是与当地农业生产有关，其中最突出的是展示‘物候观念’。”说着，他带记者来到“湖南人”展陈的第三部分“洞庭鱼米乡”，这里展示了距今1.5万年至8000多年前的稻谷标本。“1.5万年前，湖南的先民就开始了人工栽培水稻，是稻作文化的起源地。”熊建华说，由此，气候的变化被赋予了許多神秘的含义，且与农业生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国古代气象学最关注的就是物候、气候、节气，尤其是物候。”当然，最初的物候学知识比较初级，古人主要根据植物的萌芽、开花、结果、动物的蛰眠、始鸣、繁育、迁徙及气候中的始霜、初雪、初冰、解冻等，来“指导”农事安排。这在一些先秦文献，如《夏小正》中可以看到。“青铜器上的一些纹饰，很难用图腾概念解释，但用物候观念去解读，就很容易理解了。”他举例道，蝉纹的蝉并不威猛，但在青铜器上出现频率却相当高，这应该就与它在物候学上的意义有关。同时，他发现湘江流域出土的很多青铜器上蛙、龟、鱼、蜥蜴等纹饰，在造型特点、组合方式等方面，与其他地区表现的同类纹饰差异很大。“这些不同之所以产生，我认为就是因为这些纹饰要传达的是各地不同的物候情况或知识，而不仅是原始的宗教信仰。”

在采访中，多位青铜研究专家都表示，湖南大量动物形器的出现原因，目前学界还未取得共识，仍处于推测阶段，有待今后进一步研究。